

在闇黑的年代， 為理想掌燭的作家 ——訪談前輩作家蔡德本



訪談者／林佩蓉、陳慕真 文・攝影／林佩蓉

現在雖可慶幸這恐怖的時代已成過去（雖然不是完全過去），但我們仍當努力建設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拒絕再活在恐怖的陰影裡。期望生聚於蕃薯島上的族群，能和平相處，更加努力，讓這個島上不再有恐怖的政權出現。

蔡德本，《蕃薯仔哀歌》，1995. 2

離國立台灣文學館的不遠處，與台南大學相對，交疊在來往車輛的喧囂，靜視時代的變遷。我們在陽光充足的早晨拜訪了蔡德本先生，他親切的引領我們到他的書房，在那將書籍、資料、信件分門別類的收納整齊的空間中，透過訪談，我們得以跨越時空，聆聽半世紀前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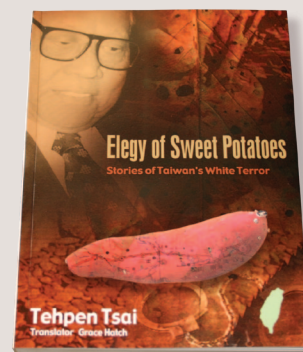
蔡德本先生（以下稱謂省略），自《蕃薯仔哀歌》中行走的佑德，從戰後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到1949年的「四六事件」，這位台灣文學戰後最早推動台語現代戲劇的文學家，以靜默之姿，沉靜的走在巨變的時代，為理想掌燭。

1925年出生在嘉義縣朴子鎮順天里「源遠」舊家的蔡德本，自幼生活在當時的「名家」，父親及其家族經營船頭行—「源遠」，專門製油，

來往的船貨停泊在朴子時，父親便會招待從遠方來的朋友，當時有不少中國來台的朋友自由進出蔡家吃喝食宿。有著三位姊姊、二位哥哥的蔡德本，是家中的么兒，回憶家中時常高朋滿座的情景，認為自己因深受父親豪爽樂觀的個性影響，對於青壯年時所遭遇到的政治迫害，方能有所釋懷，並積極的透過書寫、創作，為台灣五、六〇年代的歷史，留下重要的記錄。

以近七十歲的年歲，在自1993年開始先以日文完成《台湾のいもつ子》，再自行翻譯出版《蕃薯仔哀歌》，這是蔡德本將自己心中埋藏了四十餘年之後，隨社會風氣的轉變，才願意吐露出來的哀歌，那是以自身在1949年「四六事件」後的境遇為主軸，以1954-1955年獄中生活為場景，為台灣的「白色恐怖」史作了深刻且動人的刻劃，可謂是重要的台灣文學作品，甚可稱其為台灣政治小說中的一種典範，而彭明敏為該書寫序時，評為是「囚犯文學」（林曙光先生稱之為「監獄文學」）的一部傑作。這一本《蕃薯仔哀歌》被翻譯成日文及英文，並列入日本暢銷書排行榜中，近年來在日本已再度出版，台灣也即將由前衛出版社再版，不少國外人士，亦透過此書的多國譯本去了解台灣戰後的歷史。

然在此之前，蔡德本早已在1946年戰後初期，在《台灣新生報》發表了二篇短篇作品〈啤



酒〉、〈苦瓜〉，也開始著手寫長篇小說《被迫當兵的人》，這是以他自日本留學回台後的第一年（1944年）即被徵召入伍的背景為題材，該小說一直寫到「二二八事件」前完成，經過長兄蔡德馨的閱讀，原本要尋找印刷出版的管道，卻因為人事的變遷，而使得那篇作品至今下落不明。同時在1947年2月，蔡德本亦完成一部中篇小說—〈消えたロザリオ〉（據蔡德本口述，譯為〈消失的項鍊〉，該項鍊是天主教的掛珠，這也是目前蔡德本家中僅存的創作手稿）。此部作品特別值得一提，當時原本已經要將此篇作品送交林曙光先生翻譯的途中，發生了「四六事件」，以致未能面世，卻是台灣戰後最早開始書寫原住民及當時中國來台的外省兵產生衝突而發生悲劇的故事。蔡德本說這是個社會事件，發生在當時一部要開往花蓮的公車上，因為班次不多，途中遇到了一票外省兵，這群軍人一上車之後，為了有方便的座位，趕下了原本在車上的人，並命令原住民司機按照指示前往目的地。當時的社會氣氛已因著不同族群的過多衝突，達到了飽和點，只要再輕輕一刺，就會發生無法想像的暴裂與衝突。原住民司機或許之前已累積了許多的屈辱，無法再忍耐，於是拋下即將要見面的情人，開著這輛載滿外省兵的公車，直直往懸崖的方向衝去，全車落海無人生還。在那衝進死亡的剎那，有許多的畫面充滿在這位原住民的司機腦海中，他緊握一位日本友人在戰敗後送予他的天主教掛珠，原

本打算轉送給下班後就要見面的情人，卻在那個時刻作出壯烈的決定。這是一個悲劇，蔡德本靜靜的以文學家的筆記錄了這個曾經轟動一時的社會事件。因為有這樣的一個作家，我們得以從他的作品及談吐中看見了台灣人如何以各樣的姿態，或直接的反抗、或迂迴的迎對，為作為台灣人的身份勇敢的堅持著，蔡德本雖不是激烈的革命份子，卻在最闇黑的年代，為理想掌燭，讓後來的人透過那光，看清一段歷史，一個生命的印記。對於台灣文壇來說，除小說之外，蔡德本致力於台語話劇的用心，亦讓人感佩，然而這也是他一腳跨進台灣政治社會史的一顆媒介。

台語話劇運動及《龍安文藝》

1944年，蔡德本在戰爭中回到台灣，由日本神戶搭船，與後來推動台灣獨立運動同時亦是重要的台語學家、劇作家的王育德同船，原本三天二夜的船期，那一回坐了十三日，蔡德本回憶與王育德朝夕相處的十三天裡，聊了許多有關於話劇的事情，回台後兩人開展不同的境遇，卻有一段時間，王氏在台南，蔡氏在朴子，於各自的家鄉，致力於話劇的推動與演出。1945年終戰後，蔡德本放下小學教員的職業，先是進入台灣大學後轉進台灣師範學院就讀，開展了在台灣文學史上重要的劇運時期。蔡德本回憶自己愛上戲劇的年少歲月，那是在1937年赴日與長兄蔡德馨一起求學的時期，熱愛文藝的蔡德本對戲劇情有獨鍾。



據他回憶，當時日本第一書房出版的《世界近代劇全集》所列的主要作品，幾乎全部涉獵，「那是個什麼樣的劇本都讀的時候」，也因此對於日本現代戲以至到當時由日人轉介的歐美近代劇的作品皆非常熟悉，這些閱讀成為蔡德本回台後發起、投入台語話劇運動的重要基礎。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那一年，蔡德本與同學共同組織「師院台語戲劇社」，並任社長，從事寫實主義的台語戲劇運動，他特別強調是話劇，有別於日治時期的新劇、台灣傳統的歌仔戲，是很內斂的表達情緒，「靜靜的哭」那樣的深沉，並且以寫實主義的手法展演。為什麼強調要用台語的原因，蔡德本很精簡的說：「因為是台灣人呀，台灣人就是要說台語的，那時雖然中國人來，但我們只覺得台語被禁止很久了，應該要講呀，平常台語就是日常語言，但就是要進一步的去探究如何說，那時研習的時候，就是互相教、互相學，也沒有什麼教材」。為了推動台

語話劇運動，蔡德本等人還舉辦了座談會。蔡德本回憶，那是在1947年左右，當時《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的主編歌雷、作家楊遠等人皆出席，一群人對台語很積極的投入，蔡德本說歌雷雖是外省人，但是對台語是支持的，也鼓勵蔡德本等人創作，用日文也沒關係，當時是由林曙光翻譯。那場座談會討論很熱絡，圍繞著台語要怎樣表現、書寫、說法。

台語話劇的公開演出，蔡德本從改編中國劇作家曹禹的名作〈日出〉，以〈天未亮〉為名在台灣師範學院的大禮堂演出，社員都是業餘的，彼此互相學習、指導，對於不會唸的讀音，尋找容易記憶的方式，蔡德本笑著說，有點像是土法煉鋼，但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建立起台語話劇社的基礎。自1947年到1949年台語戲劇社不只在師範學院中演出，亦由蔡德本組織朴子學生聯誼會，在朴子的榮昌戲院、嘉義市中山堂演出。戲碼從改編到自創，除〈天未亮〉之外，尚有〈阿丁的



1947年「師院台語戲劇社」社員演出後的珍貴留影，該社社員皆為當時師院學生，於白色恐怖時多數遭到國民黨處以死刑或羈押，該社團也在政治壓力下被迫結束。前排右一：朱實，右二：鄭澤雄，右五：鄭鴻溪，中排第十一位：蔡德本，後排右五：林亨泰，第十六位：楊英風，第二十四位：林曙光。（圖片由蔡德本捐贈，國立台灣文學館收藏）

死亡〉（ども又の死）、〈愛流〉、〈萬世師表〉等劇。

活動力甚強的蔡德本，當時亦與其他的同學如黃昆彬、林亨泰等人在《台灣新生報·橋副刊》投稿發表作品，然因備覺一個文藝團體應該要有個屬於自己的刊物，因此創辦了「龍安文藝社」，並擔任社長。蔡德本提到：「當時的出版物多是用刻字的，刻在蠟紙上，而使用排字的印刷物且是學生所做的，《龍安文藝》是第一本。」蔡德本這樣回憶著，當時也在創刊號上發表了〈雞埗〉，卻在印製出版的前夕發生「四六事件」，「當時事情一發生，逃跑的逃跑，被抓的被抓，我們一群人只好將所有已印好的《龍安文藝》從不同的地方拿出來，一面燒，一面流眼淚，很捨不得，出版一個刊物多麼的不容易」，當蔡德本想起這一段往事時，聲音仍不免低落。我們問他那些創作的作品、手稿還在嗎？他無奈的回答說，當時也沒有影印機，一寫完為了能順利出版，都會拿去給學校、警察局登記取得許可，因此都沒有留下來。

從運動走向教職

「四六事件」之後，蔡德本以公費赴美留學一年，再度執起教鞭，卻在回國的1954年，因被友人指出「蔡的書架上有毛澤東的書」而被情治

單位拘捕入獄，展開了為期近十三個月的黑牢之災，這些歷歷在目彷彿隔日的記憶，在《蕃薯仔哀歌》中描述得很詳細。1959年舉家遷移到台南市，蔡德本執教於台南一中，直到1990年退休，靜靜的從自己學術的專長出發，撰寫不少高中英文等相關升學書籍。在退休後的一年，蔡德本開始執筆以日文撰寫《台湾のいもつ子》，該作品一出版後便為台灣文學增添了精彩的記錄。蔡德本起身拿出一疊編排有序的文學評論與我們分享，從台灣的各報紙所評論的文章到美國如「亞馬遜書局」的高度評比、日本「每日新聞」名筆的介紹，足見台灣文學至少已藉由《蕃薯仔哀歌》走向國際化，甚者有國外看到國內的介紹，而訂了數十本的書籍。蔡德本笑著說：「有些日本朋友，來台灣很多年了，以為已經很了解台灣，卻在看到《蕃薯仔哀歌》之後才驚覺發現，原來台灣還有這一段歷史。」隨著年歲的增加，蔡德本一路從運動走向安穩的教職工作，直到現在兒孫成群安享晚年，對於時局的多變，他寧願以豐富生命的角度去觀看，個性開朗的他，晚年在眼力允許的前提下願意持續創作，加上平日便大量閱讀的他，這樣的精神讓後輩的我們敬佩。

走過闇黑的年代，蔡德本沉靜的堅持，為台灣島嶼銘刻重要的記憶。✎